

■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·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②

为抗日救国，刘齐滨不顾虚弱的病体，为“红三村”的存亡夙夜操劳。繁重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。临终时，他嘱咐：“我死后可开个小型追悼会，但要节约，通知各县自带干粮，烧锅开水就行。对家属不要特殊照顾，让他们自食其力……”1942年5月29日，刘齐滨病逝，年仅34岁。

刘齐滨：抗日流血弃命不言悔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郭登奎 汲云朋

冬日的曹县，浓霾深锁，细雨霏霏，百米之外牛马难辨。沿着窄直的乡间公路，记者一行来到了位于曹县西北的韩集镇“红三村”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刘岗村人刘齐滨在这里领导鲁西南的抗日斗争。国难当头，他不顾病痛折磨，致力于开启民智，发动群众，为抗日战争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在他的艰苦努力下，三个名为刘岗、曹楼和伊庄的乡村，成为鲁西南抗日大本营。

猎猎狼烟里，刘齐滨与三村百姓，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着最后的抗日火种，谱写了民族独立的灿烂华章。气急败坏又无计可施的日军，用红笔在军事地图上将三村圈在一起，特意标注一个“赤”字，“红三村”竟因此得名。

今日的“红三村”，村落整齐，百姓富足，村容村貌与当年相较已是沧桑变化。但苦难岁月沉淀的记忆并没有因时光荏苒消逝，它凝聚升华镌刻成集体追忆，历久弥新。

弃工从文为民请愿

刘齐滨，1908年生于刘岗村一户清贫的耕读家庭，祖父粗通文墨，父亲做过乡村塾师。刘齐滨幼时，祖父与父亲便勉励他努力读书，将来做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。

如果在和平之日，刘齐滨应该走一条幼读四书五经，后去“考学—做官—终老”的路子。但刘齐滨降生的清末，国家千疮百孔，百姓在天灾人祸前挣扎求生。1905年，即他出生前3年，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。

科举既废，祖父和父亲便让他就读新式学校，学习新式文化。

13岁时，刘齐滨入曹县高小就读，后考入菏泽六中。孩子得人佳校，家人自是百般高兴自豪。但窘困的家境，让刘齐滨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负累。他负责给师生打作息课铃，闲暇时在图书馆看管图书，用微薄的新俸充当生活之用。

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重担，苦难的生活磨砺坚韧品性。刘齐滨不以苦为苦，借着管理图书的契机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。书中对时局的讲解、未来的拷问，和课堂上老师所教授的知识层次截然不同。丰富的课外阅读为刘齐滨打开了一扇窗，让他了解着时代和历史的沧桑转变。随着知识和眼界的生长，一个严肃的问题越来越萦绕在他的心头。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，一个中国人应该做些什么？

日后他用抉择作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：把自己融入国家命运的长河里，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，直至最后一滴血。

1928年，刘齐滨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。当时的他，与多数知识青年相仿，笃信技术救国理念，渴望用技术推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。

但也就是在这一年，日本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，大批中国军民惨遭杀害。刘齐滨闻知后，内心深受震动。

一边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不断加深，一边却是新军阀忙于内战争地盘。残酷的现实很快将刘齐滨的救国梦想彻底碾碎。在混乱局势里，受难最深重的无疑是无辜百姓。而志在救国的刘齐滨，也因战火的波及被迫放弃学业。他穷困潦倒，孤身逃到济南，靠文字艰难谋生。后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他回到曹县女子高小授课。

奔波逃难的日子里，刘齐滨陷入了对工业救国之梦的深深迷茫。

在乡间，刘齐滨目睹了中国乡村的崩坏和磨难。百姓劳碌终日，却仅能勉强糊口。而他们面对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勒索压迫，却又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毫无知觉。

刘齐滨认定，中国现今最重要的问题，不在技术之落后，而是思想的散沙，“以文救国”“改造思想”，他和鲁迅面临相似的困境，作出类似的抉择，决定弃工学文。

由工转文，跨越颇大，难度颇大。刘齐滨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埋头苦读，甚至通宵达旦不休息。

“听我的长辈说，刘齐滨就是那种认准了目标便不放弃的人，学习如此，救国亦是如此。”72岁的村民刘金玉说，他常听父亲说起刘齐滨的事迹。



刘齐滨画像



刘岗村祠堂，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联防指挥部 鲍青 摄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31年，刘齐滨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。在思想活跃的高等学府，刘齐滨看见，听到了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新观点。他如鱼得水，畅快吮吸着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乳汁。当年9月18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，占领了中国东北。东北无数难民被迫逃入关内，涌进北京。刘齐滨见难民逃离故土，骨肉分离，凄惨痛苦哀嚎之状，悲不自抑，奋笔疾书写下抗日救亡独幕剧《中秋之夜》。

“他那时候已经把个人的使命融入国家前途中去了。”89岁的刘效民说。

北平大学生眼见国难当头，国民政府忙于内战，便决定组织南下请愿团，经天津、山东和江苏，前往首都南京和平请愿，表达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诉求。12月中旬，刘齐滨被选为请愿团代表。在南京，请愿得到上海、江苏和浙江等地群众的支持，规模越来越壮大。军警四处搜捕学生代表，刘齐滨的肺部被打伤。在狱中，刘齐滨坚贞不屈，后在爱国人士的营救下出狱。

然而，肺部受创成为他日后病痛的梦魇。1933年，刘齐滨不幸感染肺结核，病体逐渐沉重，难以支撑学业。他只得辍学再次归乡。

不慕名利矢志救国

刘齐滨当时是曹县西北唯一的大学生，再加上他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，在当地名气大、威望高，各方势力都谋划着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阵营，利用他的威望壮大力量，怀着救国救民梦想的刘齐滨，起初进入国民党曹县政府，希望能为救亡图存做点实事，没想到纵然国难当头，政府内部仍是莺歌燕舞，醉生梦死，各级官吏沆瀣一气，腐败成风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刘齐滨只能感受到压抑和痛楚。不久，他决定挂冠离去，不再为五斗米折腰。

回到刘岗村，刘齐滨以村庄为基地，开始他的乡土改造计划。1933年11月，鲁西南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刘岗村正式成立。刘齐滨白天和村民一起劳动，晚上则在村庄公共祠堂，给30多位青年农民传授知识。他不仅教大家读书识字的基本技能，更向他们传播先进的思想观念。

古老而守旧的中国乡村，自此发生了细微的可喜变化。

1934年，刘齐滨被友人介绍到菏泽六中代课。任教期间，他大胆介绍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，更将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让学生自由讨论，鼓励他们树立为国奉献的信念。他讲课幽默风趣，旁征博引，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。

当刘齐滨为改造乡村艰难求步时，党组织派遣袁复荣、王石均等人赴曹县开展地下活动。刘齐滨闻讯后，立刻和他们取得联系，利用自己的威望帮助开展工作。

1937年7月7日，宛平的枪声响起，全民族抗战爆发。

当年秋天，中共曹县县委宣告成立，领导起曹县西北的抗日救亡行动。刘齐滨在党组织的耳濡目染下，认定自己找到了追求民族独立的良方。他以夜校学员为基础，组织宣传队，跑遍刘岗周围上百个村镇，号召大家团结一致，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。

1938年，刘齐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不久，

鲁西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刘岗村成立，会议选举了党支部书记、宣传委员、组织委员和监察委员。此后，鲁西南的抗日形势焕然一新。

不计得失倾尽所有

1938年，刘齐滨任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会长。当年冬天，南下日寇占领曹县县城，中共曹县县委转移到曹县西北活动。

此后，党组织派遣众多骨干力量来到刘岗开展抗日斗争。这些陌生人以刘齐滨家为集散基地，致力于开启民智，发动群众。

刘齐滨家成了党组织和抗日干部的联络中心。大家一起开会、吃住，研究曹县抗日的前途命运。陌生人来来去去一拨又一拨，刘齐滨每次都管吃管住，热情接待。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生活，刘齐滨先是将院落周围的树木砍伐出售，继而变卖农具，最后连祖上的几亩土地也贱卖了。后来当地反动势力为示警告，放火焚烧了他的祖屋。刘齐滨听说后却淡然地说：“这一烧，大家就看清楚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了。房子烧了，我也再没有牵挂了。”

“为了抗日，刘齐滨什么都可以牺牲，甚至包括他自己，何况区区身外之物呢？”刘效民说。刘效民对当时村庄的前后“蜕变”记忆犹新，“感觉早先死气沉沉，后来就朝气蓬勃。”

让村庄从散沙而成坚铁的催化剂，正是刘齐滨和一群不计得失的陌生人。

刘效民回忆说：“这群陌生人穿着普通简单，和一般百姓没有多少区别。他们经常帮大家干活，还会找村民聊家常，一点干部的架子也没有。我那时候经常看到他们早晨在刘齐滨家门口刷牙，看到有村民经过还会热情打招呼。”

刘齐滨和陌生人在村中从思想启蒙着手开展救亡图存。刘效民也感受到了启蒙的力量。他原先读书，用的是国民党发行的教科书，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是看图识字，内容是“小猫、跳跳跳”。刘齐滨找来一台老式油印机，用包东西的红纸、彩纸自己印刷新课本。“我还记得是村民刘笑森和刘星凯上课，第一课学的是‘人，我是中国人’；第二课则教我们‘我是中国人，我要爱中国’。”

刘效民坚信，刘齐滨是要让他们自小培养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。

村中的公共祠堂，白天是孩童们读书识字的场所；晚间则是“农民夜校”，刘齐滨在这里组织农民学习文化，了解时势。

刘岗和曹楼、伊庄“红三村”燃起的红色火苗，让外部敌人嗅到了危险气息。他们对“红三村”进行严酷封锁，企图扼杀于摇篮中。

一开始是纸张供应紧张，尤其是白纸更是稀缺。有人写信到刘岗，回信人没有白纸回复，只能在原先信纸的空白处修书。

不久后，连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愈发紧缺，甚至连食盐都无法供应。海盐运不到村子，村民只能用碱土来煮盐。这种自酿盐味道苦涩，有轻微毒性，但在当时却是抢手的重要物资。

刘齐滨家里的陌生人，每天就用这自制苦盐刷牙。他们经常到村民家中走访谈心，鼓励大家坚定信念，熬过艰难岁月。

刘效民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当时的我们不理解，

刘齐滨和陌生人，为何不要钱不要物，还要教授农民识字明理，提高觉悟呢？”

军民一心协同抗敌

在刘齐滨的苦心经营下，鲁西南抗日形势逐渐明朗，刘岗、曹楼和伊庄，成为鲁西南抗日大本营。

1939年2月16日，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，率领一个营兵力，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。他们在刘齐滨帮助下，联合当地抗日武装，组建冀鲁豫边区支队，开辟了以曹县为中心的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。

当听说八路军物资紧缺后，刘齐滨组织百姓带着红薯和萝卜前去劳军。

爱看热闹刘效民，也乐呵呵地跟着队伍“看大兵”。

刘效民也曾见过军人，但多半是军容不整、纪律败坏的军阀军痞子，“拿老百姓的东西，抢老百姓的粮食，满口都是脏话，老百姓怕得不行”。

可刘效民刚到劳军地点，就看到一个别着盒子枪的八路军和百姓在拉着大锯，“两人干得热火朝天，还有说有笑”。

其他八路军战士有的用扫帚清扫街道，有的帮百姓挑水劈柴。劳军的百姓先是目瞪口呆，继而喜笑颜开。

劳军回村后，刘齐滨向大家介绍八路军是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救亡部队。同行百姓也绘声绘色传播着此行的所见所闻。一时间，刘岗村都在热议议论：“啥时候八路军到咱这来，帮着打鬼子啊。”

刘齐滨此后带领三村百姓，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。抗日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，“红三村”的名气也愈发壮大起来。

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闻听“红三村”的抗日事迹后，不禁夸奖：“你们光荣的斗争，你们光荣的名字，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的心中。”

1941年5月1日，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二专署成立，刘齐滨被任命为专员。

在成立大会上，刘齐滨在根据地、游击区和敌占区各界代表和刘岗村群众上万人的见证下，坦露肺腑之言：“……对敌人，我有无限仇恨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，我不惜牺牲个人一切……我当专员是人民的公仆，就好比给人民当长工。我保证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疾苦，尽心尽力为人民办事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一定廉洁奉公、公而忘私地做好革命工作。如果大家发现我有失职或有违背诺言的行为，请随时将我罢免。”

刘齐滨所说的慷慨激昂，刘齐滨所做的不打折扣。

专署成立后，刘齐滨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日夜操劳。为了解游击区和敌占区的真实情况，他经常徒步走访，和根据地百姓拉扯家常。

后来县级政权发展到11个，区、乡政权和农、青、妇等群众组织也都相继建立起来。

宽以待民严于律己

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壮大，周边反动势力也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。

“我只记得，那时候我就读的抗日三中进行

疏散隐蔽，伪军经常对我们进行扫荡。”刘效民说。

当时的抗日三中进行，没有教室，没有桌椅，也没有课本。学校只有一台油印机，主要从报纸上复印社论新闻，老师给学生讲解抗日形势。

孩子们每人有一个背包，起床后先打好背包，里面装有学生的全部身家。“上课集合背着背包站队。夏天寻觅个树荫上课，冬天找个背风院子读书。上课时，人盘腿坐地上，背包放下来当书桌。”

午饭时间，伙房推着锅灶，找个空旷地面，挖个坑洞，埋锅造饭。

可这样简陋的学习环境，也难以正常保证。刘效民说：“有段时期，学校会经常疏散转移。本地学生回家隐蔽，外地的则提前在当地认个干亲，发点粮票寄宿在百姓家中。”

刘齐滨那时候的生活也是寒酸清苦。

为培养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，刘齐滨先是否定各项财政收支制度，杜绝物资浪费。有一次天气酷热难耐，有人提议买西瓜消暑。刘齐滨见有人有了脱水症状，担心中暑耽误工作，便批了个条子：“西瓜用款，请从我的津贴费中扣除。”后来会计入账，因考虑他体弱多病，便从公杂费中支出，没有扣他的津贴。在月底查账时，刘齐滨发现了此处漏洞，他批评会计：“不要把它看成小事，这样乱开支下去，制度被破坏了，人民的财产就要受损失，个人也容易犯错误。”他坚决要求补交了购买西瓜的费用。

这年冬天，上级考虑到天气寒冷，给专署拨发了一批棉衣御寒。但因为物资紧缺，专署干部每人都摊不上一件穿。刘齐滨的棉衣单薄，又因肺病身体虚弱，分发衣服的工作人员便自作主张分给了他一件。但刘齐滨却坚决不接受，他说：“我这件棉衣旧点破点没关系，破了补一补还能穿。”分衣服的同志说：“您是专员，按标准可以换件衣服。”但刘齐滨却坚决不接受。

刘齐滨对自己要求严苛，对有需要的百姓却非常慷慨。他对因抗日而受伤的百姓，要求抗日医院予以及时救治。

1940年，“红三村”在邓庄附近的庄稼成熟了。困难岁月里，粮食是弥足珍贵的物资，也是各方势力垂涎欲滴的香饽饽。收获庄稼，往往要冒着以命相搏的危险。村民“二丸子”和几位村民，带着一些简易兵器，小心翼翼地前去收割。收割时行动虽然谨慎，但还是被附近的伪军哨兵发现了。敌人开枪打伤几位村民，“二丸子”的脖颈处被子弹穿透。他回村后也没有言语，只是从村里老中医处拿了副膏药，便独自在家休养。“二丸子”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，开始化脓感染。刘齐滨了解情况后，立即安排“二丸子”到根据地医院治疗。一个多月后，刘效民在村口看到了伤愈归来的“二丸子”，“他披着破被子，但比走之前白胖了许多。他笑嘻嘻地对我们说‘八路军的医院里，打针吃药都不要钱。要不是八路军的医院，我肯定是活不了了。’”

披肝沥胆不忘初心

1940年9月，在鲁西南驻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，奉命西渡黄河参加反“扫荡”行动。根据地只留下了不足百人的独立团进行防守。主力部队撤离的消息被伪军获悉后，各路反动势力立刻向根据地大举进犯。刘齐滨率领单薄的兵力，和大家协同保卫家园。但因敌我力量悬殊，边沿的村庄相继失守，至10月初，只剩下刘岗、曹楼和伊庄三村。

“红三村”是鲁西南抗战的最后火种，刘齐滨召集抗战队伍，宣誓要与抗日共存亡。刘齐滨此时肺病发作，常常痛苦难当。但他依旧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思索着抗日良策。

在刘齐滨的苦心擘划下，“红三村”在敌人的围剿下艰难地存活了下来。但刘齐滨的身体，却已经不堪重负了。

1942年初，刘齐滨的肺病开始频繁发作。组织上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，让他离职休息治疗，但刘齐滨仍忧虑着根据地的存亡兴衰。同志们前来探病，他总是先询问百姓的生活如何。

为了照顾刘齐滨，专署研究决定，拨发给他300斤小麦，用于滋补身体。300斤小麦，如今只能算是人口的粮食而已。但刘齐滨知道后坚决不收。他找到粮秣科长说：“现在斗争条件艰苦，军队给养往往不足。我躺在床上，一不打仗，二不工作，对抗战没什么贡献，怎么还要享受额外的照顾？”纵使别人苦劝，他坚决把小麦退了回去。

肺病愈来愈重，咳嗽频繁，疼痛剧烈，刘齐滨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他逐渐自知到了弥留之际。临终前，他忍着痛苦，向身旁同志们嘱咐后事：“我死后，可开个小型追悼会，要节约，通知各县自带干粮，烧锅开水就行。对家属不要特殊照顾，让他们自食其力。请同志们不要难过，你们做好工作，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”。

1942年5月29日，刘齐滨病逝，年仅34岁。

从弃工从文到矢志救国，刘齐滨的一生短暂而艰辛，但他不慕名利权位，时刻牢记救亡图存的信念，将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国家独立民族自强，为抗日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
·相关链接·

日寇将千名村民逼进水坑中，百般酷刑虐待。为了守护抗日火种，众多村民宁愿牺牲生命也不出卖信仰。共产党员秦兴体为了百姓安危，挺身而出。鬼子残忍地将他钉在木板上，用火灼烧烧烤……

水牢惨案：用鲜血守卫抗日火种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1942年5月29日，鲁西南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刘齐滨因病逝世，根据地尤其是刘岗村百姓笼罩在伤痛之中。

而根据地外的敌人，却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抹掉“红三村”这个眼中钉肉中刺。

“红三村”百姓化悲愤为力量，同仇敌忾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。

到了1943年的10月6日，敌人趁着八路军主力部队转移作战，纠集一千五百多名日军和伪军把“红三村”包围得水泄不通。当日清晨，刘效民在打麦场外看护收割好堆放的庄稼，他听到西南六七里远的地方突然响起“咚咚”两声炮响，接着是枪声大作。他知道大事不妙，立刻起身往家的方向奔跑。

当时是收种相叠的农忙季，刘效民回村途中

碰到了牵着牲口的大爷。大爷告诉他：“日本人说话听不懂，汉奸不让我出去。”

回家一况情况，家人立刻让年轻的他赶紧到地里躲躲。但刘效民刚到村边，就遇到埋伏在此的两个汉奸。汉奸用枪指着刘效民喊：“哪儿跑！再跑打死你！”刘效民见出村道路阻绝，无奈又跑回村庄。

后来他趁着敌人搜索共产党员的契机，幸运地从村中角落逃了出去。

刘效民在外面躲了九天九夜，回来后却发现村庄已是物是人非。

“死了许多村民，全村哭声震天，简直如人间地狱一般。”

狱中经历的村民泣血地向刘效民讲述日军在“红三村”的暴行。

日军将百姓赶到寨门外一个为抗击日寇而挖的水坑边。许多村民被踹进水坑，有的村民因

为想逃走而被打死了。

一千多村民被囚禁在齐腰深的水坑里，敌人在四周架上机枪，残忍狞笑。“水坑变成了水牢，日军就在水坑边看着百姓受苦，享受着囚禁的快乐。”刘效民说。

日军囚禁百姓的目的，是要用酷刑逼迫村民交待谁是共产党、谁是八路军。

当时根据地在村中设有被服厂，为前线的抗日队伍生产被服用品。虽说是个厂，但其实分散在好几家村民的家中。没有集中的厂房，都是用缝纫机来生产。

敌人即将进村时，被服厂立刻转移了机器设备。而来不及撤离的工作人员在百姓掩护下，乔装打扮混入群众队伍中。

为了抓出百姓中的抗日分子，日寇折磨百姓无所不用其极。“他们用枪杀，把村民吊在树上，还往村民肚子里灌脏水……”

为逼迫一位村民就范，两个日本鬼子往他肚子里灌泥浆水，灌得鼓鼓后，又用大腿粗的棍子在肚子上捣鼓，脏中脏水顺着口鼻全流出来了。

夜幕降临，日军将“红三村”村民赶到两座房子里，安排人看守。等到天明，再将百姓赶到水牢中继续折磨迫害。

刘效民说：“那么多村民就挤在两所低矮屋子里，可以说是人挤人，连个下脚地方都没有。”年轻力壮的青年爬到屋梁上，给年纪大的村民腾出点空间。“日本人不准百姓休息，不准出门，大小便都要在屋里解决。整个环境闭塞闷热，污浊不堪，一些年老体弱者被活活闷死。”

在长达九天九夜的折磨中，共有73位村民壮烈牺牲，用鲜血守护着抗日火种。

看到村民遭受凌辱，人群中的秦兴体愤怒难当。他是河南修武人，当时任五分区根据地供给部的保管股股长。当得知日寇即将扫荡的消息

后，他组织人员将边区货币、缝纫机、棉花和布匹等物资就地掩埋。但因为急于要掩护断后，错过了撤退良机，在群众掩护下进了水牢。

秦兴体平时在村中为人慷慨好施，对百姓极为体贴。为保护秦兴体安危，有村民把他挡在人家后，免得引起日军注意。在日军折磨村民时，百姓将秦兴体紧紧守住，防止他忍不住冲上去。

眼看着多位村民因为保护自己而牺牲，秦兴体再也难以忍受痛苦的折磨。他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：“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共产党，不要再折磨乡亲们了！”

日本鬼子立刻把秦兴体捆绑起来，威逼他说出隐藏的军用物资、交待根据地情况。在被秦兴体拒绝后，日军恼羞成怒，用皮鞭不断抽打他的躯体，还泼洒硫酸，折磨他的皮肉筋骨。

纵使日军百般虐待，秦兴体也是闭口不言。日寇残忍地将他钉在木板上，用火灼烧炙烤，秦兴体始终不发一言，最终为革命壮烈牺牲。

如今的水牢已经被填平成广场，难以寻觅当年的凄惨遗迹。

2013年，刘效民将秦兴体的事迹写就书信，邮寄给了菏泽市委。如今在水牢惨案的旧址上，树立起了“红三村刘岗大水牢纪念碑”，铭刻着这段鲜血染就的峥嵘岁月。